

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但老人宁愿留守也不进城

如何托起返乡农民工的幸福晚年?

阅读提示

退休农民工返乡,留守老人不愿进城,农村快速“变老”。然而农村养老资源有限,有的进城务工者为照顾老人不惜返乡。专家表示,农村养老问题靠单一主体很难解决,政府、市场、社会、家庭需共同发挥作用。

还有心脏病和脑梗,每年都要住几次院,就怕哪天严重了,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

几经权衡,张万峰回到农安县买房,在县城和老家中间位置的乡镇重新开了一家诊所,上下班通勤只有10多公里,照顾父母也方便。

不少进城务工者都面临着和张万峰一样的难题:年轻时进城工作安家,本打算站稳脚跟后接父母进城,然而,老人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有着根深蒂固的故土情结,难以适应城市生活。城里楼房不如老家平房自在,和年轻人的生活习惯差异大,不想给儿女添麻烦……多重因素导致留守老人不愿进城和儿女共同生活。

年近60岁的姜源老两口可谓谈“城”色变。在长春工作的女儿每次回来都想让他们进城住一段时间,但习惯了村里的宁静自在,两人总是找借口推脱。“我们现在身体还行,农村能种地养鸡,生活成本也低。”姜源说,“在城里睡不着觉,待着上火。”

老年农民工返乡现象突出

根据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农村老年人年龄结构、空巢率、健康状况等指标均较城镇更加严峻,在经济收入水平和养老服务费用承受能力等方面均

与城镇差距较大,许多地方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老年农民工返乡现象比较突出。

“我国农村‘未富先老’问题突出,从经济保障看,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尽管覆盖面广,但水平偏低;从养老服务的供给看,老年人主要依靠家庭来养老,但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叠加农村成年子女外出务工等因素,导致农村家庭养老的照顾主体缺失,家庭养老难以维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李杏果说。

“孩子的工作生活压力也很大,双方加起来四个老人,我们真不想给孩子增加负担,如果能上门居家服务就好了。”姜源说。

李杏果告诉记者,农村市场化、社会化养老服务起步较晚,发展相对滞后,且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一直处在发展的薄弱环节,养老服务设施十分缺乏。她指出,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农村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有效需求不足,收入水平低也限制其对养老服务的消费。长远来看,发展市场化、社会化的养老服务是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必由之路。

综合施策解决农村养老难

近日,民政部联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

公室、农业农村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我国首次在全国层面专门对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作出总体性、系统性部署。《意见》明确,到2025年,农村养老服务网络进一步健全,每个县(市、区、旗)至少建有一所以失能照护为主的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省域内总体乡镇层面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服务覆盖率不低于60%。

“政府应将农村养老服务所涉土地、税收、设施、组织、人员、资金投入等要素的相关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将分散的、碎片化的政策进行整合,形成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统一规划,推动农村养老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融合。并通过重点考核、督办等举措,确保政策落地见效。”李杏果认为,农村养老问题仅靠单一主体很难解决,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等均应参与其中发挥作用。

政府在统一规划之下,应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加大农村养老服务的开放力度,增加财政资金的撬动力度,通过完善土地、税收、财政、人才、信贷等各种激励政策,激发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养老服务的积极性。尤其是要激励企业、村集体、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

“要充分尊重、激发农村养老的自治实践,鼓励村集体、老年协会、志愿服务组织等基于本地实际,探索农村养老服务新模式。还要充分利用留守农村的活力老人、妇女等劳动力,打造一支基于本地、靠得住的农村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李杏果说。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为劳动者送“清凉礼”

近日,浙江省江山市双塔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为在酷暑中坚守岗位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冰爽的绿色绿豆汤、消暑茶,送上防暑用品“大礼包”,为高温下的一线劳动者送去关爱。近年来,双塔街道大力推进党群服务中心阵地建设,设置暖心关爱服务区,提供“爱心冰箱”、共享食堂等18项免费暖心关爱服务。 本报通讯员 严力 摄

G 服务动态

山东实施五大行动关爱留守和困境儿童

本报讯(记者田国全)近日,《山东省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印发,明确实施精神素养提升、监护提质、精准帮扶、安全防护、固本强基五大行动。

《实施方案》明确,根据留守和困境儿童年龄、特点,分类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道德教育,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学校要将留守和困境儿童作为关注重点,加强生命教育、挫折教育。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等有针对性地为留守和困境儿童提供阅读指导、运动游戏、精神陪伴等服务。

在精准帮扶和固本强基方面,《实施方案》提出开展摸底走访建档活动,对辖区内留守和困境儿童摸底排查,对摸排发现的需重点关注对象制定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加强困境儿童分类精准保障,按规定落实基本生活、医疗康复、教育就业和住房等保障措施,进一步加强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有效衔接,做到应保尽保、应帮尽帮。加强儿童主任队伍和基层站点建设,构建分层级、多样化、可操作、全覆盖的儿童主任综合培训体系,推进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建设,到“十四五”末建成设施完善、机制健全、服务规范、作用有效的关爱服务平台。

此外,《实施方案》还提出要加强安全教育引导和安全风险防范。县级教育、公安、民政、团委、妇联等相关部门和单位,每年面向留守和困境儿童及其监护人至少开展一次安全知识进村(社区)活动。开展“清明、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等专项行动,深入清理整治危害儿童合法权益、妨害儿童健康成长的网上违法违规信息、网站平台和公众账号,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青海构建多元参与“大救助”格局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记者日前从青海省民政厅获悉,青海进一步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健全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工作,构建覆盖全面、城乡统筹、分层分类、综合高效的“大救助”格局,实现救助资源统筹衔接、救助信息聚合共享、救助效率有效提升,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防风险”“促发展”转变。

为推动社会救助工作更加精准、及时、有效,青海加快健全以社会救助信息平台为依托,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服务类社会救助、其他救助帮扶等5类政府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的“1+5+N”社会救助政策体系。

据介绍,青海按困难程度对低收入人口进行分层,将救助对象细化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及其他困难人员等6类,进一步健全完善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和其他困难人员的认定办法、程序和救助帮扶标准、措施等。

此外,青海对符合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的低收入人口,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病重残等特殊困难人员,纳入基本生活救助范围,分类给予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受灾人员救助、取暖救助等专项救助。对遭遇突发性、紧迫性、灾难性困难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及时给予急难社会救助,开展慈善帮扶。

青海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青海从完善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健全低收入人口数据库、加强动态监测和分类处置预警信息等4个方面加强对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推动形成“线上大数据监测+线下铁脚板核实”的工作机制,切实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

贵州这个帮扶村又拿到分红了

本报讯(通讯员甘欣鑫 刘峰)“请村组干部上台领取分红……”日前,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院)帮扶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秉县牛大场镇金坑村,给村“五大员”及14名村民小组长发放绩效分红奖励,这是继去年2月成为施秉县首个实现分红的村集体经济以来,金坑村连续第二年进行分红。

从2017年“结对”至今,8年来,贵阳院先后派出3位驻村第一书记蹲点帮扶。截至2023年底,贵阳院对金坑村直接投入资金超过200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扶贫、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以及赈灾救济等。帮助金坑村修建道路48公里,援建烤烟棚,不仅给村集体带来租金收入,还给村民增加劳务收入。除了直接投资帮扶外,贵阳院还整合各方资源,帮助该村获得各类社会捐赠140余万元,引进各类资金超过1200万元。

帮扶过程中,贵阳院充分发挥科技要素、人才要素等资源优势,逐步推进“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帮扶的转化。2023年,金坑村种植的无公害绿色生态大米及稻田鱼养殖直接产生经济价值100余万元,村集体纯收入20万余元。去年5月,贵阳院党委被贵州省委授予“全省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山西明确工伤保险费率浮动条件

本报讯(记者刘建林 李彦斌)近日,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山西省工伤保险费率浮动条件》,就工伤保险费率浮动条件予以明确,鼓励用人单位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健康企业建设,符合条件后可以下调工伤保险费率。

山西将行业工伤风险类别由低到高划分为一类至八类,不同工伤风险类别的行业执行不同的工伤保险基准费率,范围从0.23%至2.47%。建筑、铁路、公路等各类工程建设项目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缴费基数以工程建设项目合同总造价(含税)的18%计算,缴费费率按照行业基准费率核定。

山西用人单位属于一类行业的,其费率分为三个档次,即行业基准费率和在行业基准费率的基础上,向上浮动至120%、150%,不实施费率下浮;用人单位属于二类至八类行业的,其费率分为五个档次,即行业基准费率和在行业基准费率的基础上,分别向上浮动至120%、150%或向下浮动至80%、50%。工伤保险最低费率不得低于一类行业基准费率。

对持有效期内一级、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且上一费率浮动周期工伤保险支缴率小于等于20%的用人单位,费率将分别下浮至基准费率的50%、80%。对被评定为省级及以上健康企业、市级健康企业,且上一费率浮动周期工伤保险支缴率小于等于20%的用人单位,费率将分别下浮至基准费率的50%、80%。

此外,用人单位存在瞒报生产安全事故,被各级政府查实;未按照相关规定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或未及时对接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发生一起3人(含)以上死亡或者10人(含)以上工伤事故等情形之一的,工伤保险费率将上浮至基准费率的150%。



“人才夜市”寻岗位

7月7日晚,求职者在江苏省宝应县吾悦广场的“人才夜市”招聘会上寻找就业岗位。当日,宝应县举办“爱才如宝 职等你来”人才夜市招聘会。60多家单位进行现场招聘,提供电缆纺织、金融投资、信息技术等行业的1000多个岗位,为高校毕业生和有就业需求的各类劳动者提供求职引导和便利,助力稳岗就业。

本报通讯员 沈冬兵 摄

初中生用父亲打工钱打赏主播,这钱能要回来吗?

经法院调解网络平台同意退回。律师提醒务工者家长,暑假需加强对孩子使用网络行为的引导和监督

本报记者 刘旭

初中生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某网络平台打赏主播花了18万余元,这钱能要回来吗?近日,经当地法院调解,网络平台同意将收到的18万余元打赏原路退回。

张林(化名)跟随务工的父亲一同在辽宁大连读初中。为了方便联系,张林的父亲用自己的身份证为张林办了一个手机号。张林所在的学校中午有午饭,但需要刷卡交费,张林的父亲又为张林办了一张亲情卡,并绑定在自己的工资卡上。

2023年暑假,张林趁父母上班的机会,每天做完作业后在家偷偷玩手机,短视频平台的一些直播内容深深吸引了他。刚开始,张林只是在看直播时点赞,后来便开始向主播打赏“跑车”“飞机”“嘉年华”等礼品,有时一个晚上就打赏出上百个礼品,金额也越来越大。不到一周的时间,张林先后通过网络平台打赏从父亲的工资卡中划走18万余元。

张林的父亲发现自己的手机时不时有短

信提醒,工资卡里的钱不断被刷走,还以为遇到了网络诈骗。再三追问,才知道是儿子张林打赏网络主播把钱刷出去了。随后,张林爸爸连忙解除绑定,并注销了张林的亲情卡,还把张林的手机没收了。

今年5月,张林的父亲委托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金海、李鑫将网络平台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退还张林打赏的18万余元。

该平台辩称,打赏是用张林父亲的身份证注册的手机号登录的网络平台,用的也是其父亲的银行卡打赏,无法证明是张林操作手机打赏,故不同意退款。

为了证明是张林在暑假期间偷偷玩手机看网络直播,并通过打赏网络主播花了18万余元,王金海、李鑫进行了调查,通过银行流水可以证明,张林上学期间经常通过这个银行卡号购买午餐,收款银行账号是学校的对公银行卡号;同时,打赏网络直播的时间均是暑假期间,有时父母在上班,有时父母已经熟睡,均是张林可利用的时间;此外,张林父亲所在单位也出具了“钉钉打卡”记录,证明张林放暑假期间,父亲每天正常上班,

没有时间打赏网络主播。由于张林承认是自己操作智能手机打赏网络主播,并能详细说出网络主播的名字、穿着及直播内容等,因此可以认定,这18万余元是张林操作手机打赏花出去的。

依照民法典第二十二条规定,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张林一方认为,张林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且未经父母同意,张林的父母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终经法院调解,网络平台同意将收到的打赏钱18万余元全部原路退回。

王金海表示,依照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条件为:一是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是意思表示真实,三是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后有效。对于未成年人

通过智能手机上网打赏主播的问题,因数额较大,属于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需要其监护人同意,否则无效。

“暑假期间家长只注重督促孩子学习,完成作业,缺乏与孩子交流,也没有时间照看,容易导致孩子通过网络直播宣泄自己的情感,沉迷网络。”王金海告诉记者,依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加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宣传教育,培养和提高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增强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行为,加强引导和监督。同时,家长也应当与孩子交流,断开孩子的手机与自己银行卡的捆绑,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

王金海建议,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学校、家长应当提高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规范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行为,加强引导和监督。同时,家长也应当与孩子交流,断开孩子的手机与自己银行卡的捆绑,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